

礼俗分治与互动：明清时期徽州奢嫁问题研究

张文禄

(亳州学院 教育系, 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婚礼是礼与俗的结合体,奢嫁是礼的名义下的具体民俗活动。明清徽州的奢嫁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礼俗分治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面对奢嫁之风,徽州地方士绅试图通过礼俗互动来调适二者的关系以达到抑制奢嫁之目的。利用徽州地方志和家训资料,从礼与俗的角度研究奢嫁问题,既可补充已有研究之不足,又能丰富地方文化研究,亦可为建设健康文明的现代婚姻礼制提供思路。

关键词:礼制;奢嫁;明清时期;徽州

中图分类号:G127;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4)02-0067-06

奢嫁是婚姻论财的必然产物。早在汉朝时期,婚姻论财现象已经出现,“嫁娶埋葬过制,奢侈成俗,财婚之势已起,则其于嫁娶之先,必有论财货之多少者。”^[1]婚姻论财引起了社会价值导向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社会价值观反过来激化了婚姻论财问题。奢嫁是婚礼其中的一个具体活动,婚礼是一种高位要求,有着基本统一的规程,但婚礼的具体细节,比如聘礼的多少、嫁妆的厚薄等则是一个低位的风俗,因时、因地各异。关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婚姻问题,学界已有研究^①。其中虽然也提到了奢嫁问题,但大都一笔带过。本文依据地方志与家训资料,从礼与俗的关系入手,探讨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奢嫁问题,不仅能较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段徽州地区的婚姻问题,还能为已有研究提供更细微的观察点,展现传统礼俗文化的区域性与多面性特点,同时,也能更深刻地理解“礼因俗出”,找出高位层面的礼文化与大众层面的俗文化的结合点,推动礼俗同向而行,为建设健康文明的现代婚姻礼制提供思路。

一、礼与俗、婚礼与奢嫁

有学者认为,“礼与俗可分为三个层次:从微观来看,是礼、俗本身;从中观来说,是国家制度与村民自治;从宏观来讲,是国家治理与民间社会。”^[2]可见,礼与俗是不同的概念,其对人的约束力也各不相同。婚礼是礼与俗的结合体,奢嫁是在礼的名义下具体的民间习俗活动。因此,要研究明清时期徽州的奢嫁问题,必须先要了解何为礼,何为俗,何为婚礼,何为奢嫁,以及它们的关系问题。

何为礼?何为俗?《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而“丰,行礼之器也,从豆形”。至于“俗,习也”,“习”的意思是像鸟一样不停地振翅学飞,有模仿的意思。从《说文解字》可以看出,礼是沟通人与神的一种仪式或制度。随着宗法制的确立,尊祖敬宗、敬天保民思想进一步发展,礼也由沟通人神、君王特有转向了统治人民、确立等级制度、维护统治秩序,成为国家制度的一种。正如荀子所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

收稿日期:2024-03-3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变与不变:传统家训德育的时代化研究”(项目编号:SK2019A1142);安徽省教学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科型卓越小学教师教育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jyxm0967);亳州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BYR2018B01)

作者简介:张文禄(1976—),男,甘肃民乐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国史和地方文化。

① 胡中生:《明清徽州下层社会的非常态婚姻及其特点》,《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朱琳:《明清徽州婚姻若干问题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陈瑞:《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沈昕:《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卞利:《明清时期徽州婚姻礼俗初探》,《徽学(第六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谈群:《明清徽商婚姻文化考察》,《黄山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等。

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概言之,礼是宗法制下统治者维护等级差序、被绅士阶层宣扬的、要求人们对既定规则加以遵守的制度;而俗是一种学习的产物,它应该是有一个事先存在的东西,后者不管何种原因对其模仿,进而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种行为方式。如果从礼和俗的概念入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二者的关系:“礼”代表的是国家的、制度的、精英的、文字的,而“俗”代表的是地方的、生活化的、民间的、口传身授的。“礼”“俗”是相互依存的,其分立并不是那么决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化的。“礼”与“俗”会随着互动双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4]。

《礼记·昏义》认为,婚礼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5],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缔结婚姻不仅能使两个家族交好,告慰祖先、事奉宗庙,还可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因此,婚姻是家庭大事,为显示它的重要性,双方家庭会互送财物,以示对对方的尊重。男方会“纳徵”(纳聘彩礼),“先纳聘财,而后昏成”,女方也会根据家庭实际随嫁财物,《诗经》“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就是“你驾车来,我带上嫁妆嫁给你”的意思。聘财作为婚姻“六礼”之一而受到重视,嫁妆作为女子与娘家亲情见证的习俗而不谈利,“婚配论门第,治袿裳装具,量家以为厚薄”^[6]。婚礼是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程序化的规范与制度,聘礼和嫁妆只是婚礼其中的一个具体活动,是嫁娶双方在婚礼框架下借助财富相互尊重对方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尽管统治者一再强调婚姻只论门第不论财,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财富本身就是门第出身的一个表征。古代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男女双方两情相悦的爱情之上,只不过是两个家族联姻的一个手段而已。因而无论统治阶级怎样宣传或要求婚姻不论财,都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这种以门第出身为出发点的婚礼要求,自然会导致婚姻论财现象的出现。所以至迟到汉朝奢嫁便已兴起,婚礼中“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环珮。中者长裾交衽,璧端簪珥”^[7]。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嫁问题更加严重,“厚资以耀聘,或竭财以侈装”^[8]。奢嫁不仅体现在奢华的嫁妆上,婚礼讲排场也是一大表现,“世人于嫁女一事,必夸奢斗艳,苦费经营,往往有因一嫁一娶,而大伤元气

者。事后追忆所费,其实正用处少,浮用处多。”^[9]

综上所述,礼是上层阶级为治理社会所建构的一种制度,俗则是各地民众长期形成的生活处事习惯,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一直是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作为礼俗具体形态之一的婚礼与奢嫁自然也是上层规定与民间习俗的结合体,奢嫁是在婚礼框架中的一种民间习俗,奢嫁不会离开婚礼而单独存在,顺应时代要求的婚礼能约束奢嫁,但失去礼制约束的奢嫁也会影响甚至改写婚礼。

二、礼俗分治与明清徽州奢嫁之风的兴起

如前所述,礼是在俗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严格规定的、精英层面的文化,而俗则是“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10]变动而变动的一种底层文化。所以礼与俗有着不同的规范层面,当礼与俗不同步、同向发展时,礼俗互动关系就会受到影响,礼俗分治现象就会产生。明清徽州奢嫁之风就是礼俗分治的一种产物。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很多豪门望族都来自中原地区,因而他们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程朱理学的兴盛,徽州地区以朱熹的《家礼》作为处世标杆,就婚礼而言,议昏(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之礼一样不能少,“昏(婚)自定庚、纳聘、纳采、请期、辞堂、及笄,总六礼而后迎昏(婚)、庙见、合卺。及听,拜见舅姑各尊长,以正夫妇之位”^{[8]81}。同时,徽州山多地少,农业经济不发达,迫使徽州人走出大山经商,徽商遍布各地,见多识广,财势强大,在他们衣锦还乡时将山外奢靡的风俗带进了自然环境相对封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礼制文化强盛的徽州,在极力维护传统婚姻礼制的同时又在悄然改变婚礼中的具体实践活动。他们一再强调“婚姻嫁娶……专尚阀阅,阀阅相宜,贫可也”的礼制不能变,强烈谴责“婚姻论财之俗,既辱门第,又取讥笑”的婚俗^{[8]146},但在实际婚嫁过程中奢嫁之风愈演愈烈,从康熙年间“婚姻竞聘物,嫁资多繁文”,到光绪年间“嫁皆以无厚奁为耻,往往有因嫁女而破产者”^[11]。徽州在明清社会大变革中,试图继续坚守传统的礼制,以期从高位的礼约束低位的民间习俗,但僵化的封建礼教,忽视了从底层对人民的引导、教育,礼与俗同向同行的合力遭到严重破坏,传统的礼已无法完全约束俗的张力。

门当户对礼制下的士商联姻助推了奢嫁之风。

明清时期,虽然“徽俗多行贾”,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始终是徽州商人的重要特色^[12]。尽管徽州精英一再强调“凡议婚姻,当察其婿与妇之德性若何,勿苟慕其富贵,诚以婿佳妇贤,家道之所由兴也”^{[8]11},但在实际婚礼中,为“贪个纱帽往来”,不顾德才攀附官宦的现象比比皆是。《二刻拍案惊奇》中徽州盐商就甘愿将自己的义女嫁给韩侍郎做偏房;那些初登皇榜寒门士子更是一夜暴富的商贾们攀附政治权势的最佳人选,甚至那些尚未高中皇榜而有潜力的读书人也成了富商争抢的对象,“徽商对与官员联姻固然求之不得,即便是应试入学的儒士,只要将来有及第的可能,徽商也巴不得将其揽为乘龙快婿。”^{[12]404}面对徽商的这种普遍心理,那些急需资金来开拓自己仕途的中榜之人或即将获取功名的人也懂得待价而沽,寻找财力雄厚的商贾联姻。

“纳徵”之礼的异化为奢嫁提供了温床。明清时期,徽商依靠勤劳诚实,行走于各地,在获得丰厚收入的同时,也渐染外界奢华的生活风气,他们甚至以僭越等级制原则、附雅门阀的方式来扭转在世人心目中固有的形象。如安徽泾县“民居或僭仿品官宅第,男子衣文秀,女子服五彩,衣珠翠,饰金银,务华靡……嫁娶奢靡。”^[13]南陵“婚嫁丧葬之费,动数百缗,所制衣服,不唯以绮罗为珍,更力求新奇异矣”^[14]。这种奢华的社会生活方式,以雄厚资本僭越礼制、提升个人身份地位的心理,自然影响到了婚礼制度。“嫁女当胜吾家”已由重人品异化为重财富,“嫁女择佳婿,莫结势豪,莫贪厚聘”^{[8]70}也已成为一种“客套话”,在实际的婚姻关系中聘礼与嫁妆成为两个家庭财富与实力的象征,在厚聘的推动下,“官宦之家和富商大贾女儿妆奁,讲究备齐女儿一生受用。其中,不仅有几穿几戴,几铺几盖,箱柜器具,生活用品,而且还有土地、寿材和奴仆。更甚者,还为女儿打一眼井,名曰‘不吃婆家水’。一份彩礼,曰‘一个头’。有的36个头,有的48个头。彩礼队伍浩浩荡荡,曰‘十里红’”。“男方有‘回运奁’。富有人家回运奁一般有:百子红烛20斤,三斤堂烛1对,二斤厅烛1对,四两红烛2对,大红直方百副,大红全帖一千,新制凤冠1顶,新制龙衣全身,花衣全身,银塔簪头全副。”^[15]

“子妇无私货”与嫁妆私有冲突是奢嫁存在的无奈之举。《礼记·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5]840}朱熹在其《家礼》中

也再次重申“凡为子妇者,毋得蓄私财”^[16],要求已嫁女子尊礼而行,将所有私财交由公婆管理。但明清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击碎了这个美好的礼制愿景,徽州男子常年在外经商,其背后是大批独守空房、苦守家园的妇女,在“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的封建礼制下,很多妇女不仅要照顾公婆、打理家庭,甚至在丈夫去世后,还会遭到“舅姑欲强再适”^[17]的悲惨结局。即或翁姑不强迫出嫁,女子在夫家也要依靠儿子生活,因为只有儿子才有财产继承权,我们常讲的“母以子贵”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因此,许多女子,尤其是没有儿子的女子,就只有通过孤独一生孝顺公婆,以此换取公婆的欢心,进而赢得宗族的认可,得以安身立命。嫁妆不仅是女子赢得婆家尊重的砝码,更是自己日后孝敬公婆、安身立命的依靠。在此背景下,尽管有重男轻女思想作祟,但十指连心,在这个人性面前,父母尽可能使嫁妆更丰厚一些,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即将出嫁之女的疼爱,“女父母爱怜其女,恣其索求;女恃宠而骄,亦恣其所取”^[18],甚至有女子为了在出嫁之时有丰厚的嫁妆而“预自蓄藏”。

需要强调的是,礼与俗的分治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这种分治实际上指的是礼和俗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何者更加强势一点。实际上礼和俗始终是如影随形,在我为俗,在他人眼中可能就是礼,所谓入乡随俗,实际上就是一个外地人在他地必须遵守的“礼”。拿奢嫁而言,对于嫁女之家而言或许是一种习俗,但对于婚娶之家而言就是一种“礼”。因而明清徽州的奢嫁总是能找到礼的影子,也始终在礼的名义下存在,只不过是礼的教育与俗的行事出现裂隙,或者说俗的做法超过了礼的界限而已。

三、礼俗互动与明清徽州抑制奢嫁之风的尝试

张士闪教授认为,“礼”是制度化的国家礼仪,“俗”是民众自然生成的生活习惯,“尽管国家之礼与民间之俗在话语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不应视作两种不同文化的并置,而是同一种文化内部密切关联着的不同表达,只不过前者偏重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规定,后者偏重于民众生活层面的自发性传承。”^[19]婚礼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系列仪式,“男方通过婚礼迎娶作为外人的女方,其中的一系列仪式既是礼,也是俗。”^{[4]23}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性的“俗”也可能成为婚礼中的“礼”,比如徽州地区的抢婚、闹洞房、奢嫁等。

礼俗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防治“陋俗”入礼。

面对奢嫁之风对传统礼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统治阶级试图从强化国家法制的角度来维护传统的婚礼礼制。比如雍正元年,下诏要求社会各阶层人员不得违反礼法,以礼成婚,“至庶民妇女,有僭用冠被、补服、大轿者禁,违者罪坐夫男”^[20],但封建统治者忽视了“因俗制礼”,忽视了礼的本质是风俗人情的规范,忽视了“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21]的客观事实,试图通过单一的“治”来达到规复礼制的努力必然不会得到预期效果。传统中国是一个重土安迁的“熟人”社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法治与人治始终相依存在,很多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能通过地方士绅复杂的人际关系来解决,“缙绅先生者,衣冠之倡也,士林之表也,有移风易俗之责者也。”^{[6] 159}在官方努力受挫时,徽州地方士绅的宣传教化就成了劝导奢嫁的有效方式。

以礼化俗,从倡导个人修养、勤俭持家来抑制奢嫁之风。明清时期的徽州,婚事讲排场、追求奢华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社会风俗,这种风俗使婚礼由过去的“重门阀,轻聘纳,无重帛侈筵……无饮酒食肉”^{[12] 27}的简朴之风转变为“结婚颇较贫富、论门第……行聘用财或墨银百圆至二三百圆不等,媵以鱼肉饘首之类”,婚礼过程也由过去的“非素封大家不鼓乐”变为“近小康家间用之”,“而花轿鼓吹、头面酒烛,下人之把持,甲头之讨索,其实数必出于估数之外,几耗中人之产。”^[22]一次婚礼“破中人百金以上之产”^{[12] 27}的情况极为普遍。针对社会上“风俗奢靡,服饰尚华艳,室宇求高大靓丽”的现象,安徽绩溪的葛氏家族就劝导族人必须勤俭,因为“奢靡之费甚于天灾”^{[23] 25}。具体到奢嫁问题,安徽休宁的吴氏在其家规中明确规定,“男女聘定仪物,虽贫富不同,然富者亦自有品节限制,用色增多不踰十,或仪代,或花、或果饼钗钏之类,亦随时不得过奢。其贫者量力而行。至遣女妆奁,富者不得过费,以长骄奢;贫者则荆钗裙布可也。”^[23]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通过与自然环境斗争、利用自然环境而生存的国家,古代中国人民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也最清楚物力维艰的深刻含义。因而对于奢靡之风的危害深恶痛绝,面对士绅的禁奢倡议,很多人积极响应。如旌德县“婚姻中下之家论财,居丧受弟宴宾殊多靡费”的现象,经过士绅的劝导,

“近日此风亦稍更矣。”^[24]

礼俗互动,从家和万事兴来端正婚嫁观。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不变的信条之一,徽州地方士绅紧紧抓住家和这一关键话语,对奢嫁展开劝说。“今人多慕其人家之贵显富厚而娶之,不知富贵家女多养成娇惯性情,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者,异日为患其浅显哉。妇者家道之所以盛衰也,慎之慎之。”^{[23] 192}“嫁女须胜吾家,娶妇当不及吾家。”所谓“不及吾家”者,“言贫家之女,稔于艰苦,习于勤俭,得之可以为中馈助。……又见人家聘妇,一时贪其奁仪之厚,及入门,傲上虐下,不守妇道,不修女上,骄惰怙侈,以堕业破产者,又往往然矣”^{[8] 43}。在封建纲常礼教下,女子的天职就是操持家务,侍奉公婆。如果新妇娇生惯养,不懂得如何操持家务,不能尽心侍奉公婆,则家中多无宁日。而“人家不和,多因内妇造言激怒其夫耳。”^{[23] 50}尽管这种将家庭不和睦的原因归责于新妇的言论缺乏公允,但也有一定道理。新妇嫁入夫家,最亲的人是丈夫,新妇在自我诉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会直接求助于自己的丈夫,丈夫如若偏袒妻子,则会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产生矛盾,家庭矛盾由此开始。如果丈夫不帮助自己,新妇则会求助于父家,父家则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进行直接干预,甚至以撤回嫁资相要挟,直接导致两个家族矛盾的冲突。

以礼淳俗,从奢嫁引发的社会问题劝导奢嫁之风。奢嫁之风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溺婴问题。徽州溺婴问题古已有之,早在宋代,婺源地方的人大多只生两个孩子,再生则“不问男女”“辄投水盆中杀之”^[25]。到明清时期,由宋代的“不问男女”到只溺杀女婴,且溺杀女婴的风气越来越重,其原因恰如光绪四年(1878)翰林院检讨王邦玺上书请禁民间溺女所言,“民间生女,或因抚养维艰,或因风俗浮靡,难以遣嫁”^[26]。随着“民间生女多不举”的溺女行为造成的男女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各种因婚姻纠纷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不断出现。绩溪“婚礼之坏莫如抢亲……推厥原因,殆由礼物太繁,聘金过多,始无力者迫而出此,久相沿,绝不为怪,甚至酿成械斗巨案。至妆奁,则中人家约五百金之率,千金者亦间有之”^{[22] 277}。因聘礼和嫁妆问题,“嫌贫措嫁,纠众强娶,豪暴有然,有赖则否,贪聘悔婚,挟嫌改适”^[27]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对于因奢嫁而引起的溺女现象,光绪年间绩溪县南关许氏家训对此种现象强烈谴责,

“豺狼虎豹尚不自食其子，人而自溺其女，彼豺狼虎豹更凶”，“嫁资厚薄，各视力量。忍下手杀他，难道不忍薄他的妆奁？”^{[8] 39}。对“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的现象也明确提出反对，认为这是直接导致嫌贫悔嫁的罪魁祸首，“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家贫饥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至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8] 46}

四、余论

明清时期徽州的奢嫁之风实际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礼与俗分治中部分人“斗富”心理的现实反映。徽商凭借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品格，足迹遍布全国，集聚了丰厚的财富，他们在努力遵从高位的婚礼礼制的同时，基于个人攀附权贵、炫耀财富的心理，试图在礼的框架内改变礼的内容，徽州商人基于“斗富”心理而产生的奢嫁问题既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较大困扰，又肇造了今天婚姻中的高彩礼问题。因为在奢嫁之风下，奢嫁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嫁妆问题，实际是男女两个家庭（族）财力的角逐问题。很少有嫁妆丰厚而聘礼单薄、聘礼丰厚而嫁妆单薄的情况，奢华的嫁妆实际上与丰厚的聘礼是相依相存的，“富家嫁女务侈妆奁之丰厚，贫家许字大索重金，甚有因嫁女而荡产，缘娶妇而倾产者，以至穷苦小民，老死而不能婚。”^[28] 饱读诗书、历经康雍乾三朝、桐城

派代表人物刘大櫟的家庭经历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吾父母生吾兄弟四人，又女弟三人，家以娶妇、嫁女而益贫。”^[29] 今天，这种高聘礼、厚嫁妆的现象依然存在，党和政府也已关注到该问题，并制定下发了多种规章制度“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30]。但奢嫁问题并非制度层面能简单解决的问题，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因无法通过制度的强制解决而陷入尴尬境地。因此，治理奢嫁问题，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更多的还需要从道德层面入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士绅试图“以身作则，挽回风气”，通过自下而上的教育来抑制奢嫁之风，他们尝试从人心、人性、人情出发，借助孝道力量，试图在家庭伦理范围内达到礼与俗、情与理的融合统一，以此消弭礼与俗断裂所造成的治与教的不统一，这种努力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努力的积极结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今天，我们在治理婚姻中的高彩礼问题时，应该从礼俗关系入手，在明了礼俗的不同之外，更要明白礼俗互动的方式，借鉴明清徽州地方以俗入礼、以礼化俗的积极做法，在加强制度建设、高位引领的同时，要在尊重地方风俗的基础上，从家庭教育、个人修养入手，共同建设健康文明的现代婚姻礼制。

参考文献：

- [1] 陈顾远. 中国婚姻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94.
- [2] 刘德增. 礼与俗的历史传统[J]. 民俗研究，2020(6)：5.
- [3]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346.
- [4] 刘晓春. “礼俗”的“内/外”“文/野”关系[J]. 民俗研究，2020(6)：21.
- [5] 李学勤. 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18.
- [6]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道光徽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60.
- [7] 桓宽. 盐铁论校注[M]. 王利器，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328.
- [8] 卞利. 明清徽州家法族规选编[M]. 合肥：黄山书社，2014：46.
- [9] 陈宏谋. 教女遗规译注[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187.
- [10] 班固. 地理志[M]//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0.
- [11]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宁国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18.
- [12] 张海鹏. 王廷元. 徽商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76.
- [13]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嘉庆泾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3.
- [14]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民国南陵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0.
- [15] 赵华富. 徽州宗族调查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8.

- [16] 楼含松. 中国历代家训集成[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393
- [17]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民国歙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44.
- [18] 丁世良,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478.
- [19] 张士闪. 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J]. 民俗研究,2016(6):24.
- [20] 郭松义.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1.
- [21] 欧阳修,宋祁. 礼乐[M]//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5:307.
- [22] 刘汝骥. 陶甓公牋[M].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33.
- [23] 陈建华,王鹤鸣. 中国家谱资料选编:8[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7.
- [24]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嘉庆旌德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6.
- [25] 胡中生. 徽州家族文化[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179.
- [26] 冯尔康. 清代社会日常生活[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257.
- [27]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民国宁国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19.
- [28] 张松义.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2.
- [29] 刘大櫟. 刘大櫟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49.
- [30]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EB/OL]. (2019-06-23)[2024-02-21].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3/content_5402625.htm.

Extravagant Marriage in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vision and Interaction of Etiquette and Customs

ZHANG Wenl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Anhui 236800, China)

Abstract: Wedding is the combination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and extravagant marriage is a specific folk activity under the name of etiquette. The extravagant marriage in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a social phenomenon caused by the separation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ing the trend of extravagant marriage, the local gentry in Huizhou tried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iquette and custom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uppressing the trend of extravagant marriage. Using the materials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family precepts of Huizhou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extravagant marri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can not only supplement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but also enrich local culture studies, and provid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and civilized modern marriage etiquette system.

Keywords: etiquette system; extravagant wedd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zhou

[责任编辑 夏强]